



深度 六四·三十年

六四·三十年

许仁硕：六四后，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抵制中国方式表达对武力镇压的不满。哪个国家以外交折冲与实际金援协助中国突破国际制裁？答案或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2019-06-10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满城的国际媒体眼皮下，解放军在北京展开屠杀，也让中国成为国际间的众矢之的，当时在六四后甘冒大不讳相助的国家，竟是日本。摄：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满城的国际媒体眼皮下，解放军在北京展开屠杀，也让中国成为国际间的众矢之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满十年，经济面还相当仰赖外资投资以及外国政府援助，各国纷纷为六四发动经济制裁，中国经济面临了严重而立即的危机。

而在四面楚歌当中，只有一个国家独排众议，在舆论压力下折冲樽俎，协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就今日两国关系观之，或许会让许多人相当讶异，当时在六四后可说“甘冒大不讳”相助的国家，竟是日本。

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虽然日本试图采取“政经分离”的方式，搁置政治问题，放行民间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中国也打着透过人民外交，拉拢日本的算盘，但屡屡受到其他政治议程优先的干扰。特别是以文革时尤甚。

当时就连同属左翼、长年经营两党关系的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时本想与中共签署反帝国主义共同声明，却被毛泽东趁势要求日共也要展开反苏联与（日共党内）修正主义的行动，双方不欢而散。因此在随即展开的文革当中，毛泽东甚至将“日共修正主义”与日本自民党内阁同列为批斗对象，不仅拷问日共驻中人员，更发动心仪毛主义的日共党员展开内斗，弄得鸡犬不宁。在政治情势不稳之下，即便仍有日本社会党作为窗口，中日关系的整体进展仍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建交之前，日本政府就对中关系，早已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打算。结果文革还没落幕，两国就在1972年就完成建交，实是大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之外。

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正也的分析，在中苏决裂之前，中日建交的两个主要障碍，是《日美安保条约》与中华民国。在中苏决裂后，美国为了打击苏联，反而戏剧性地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这也同时意味着日本对中个关系亮起了绿灯。至于中华民国，在1971年蒋介石退出联合国后，即便日本国内仍有不少亲台派政治家，但在法理上，维持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正当性，已被大幅削弱了。

即便如此，当时中国希望切断日本在国防与经济上与台湾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也要求日本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象，再次解决终战与战后赔偿问题。对于前者，日本仍希望比照建交前的对中关系，与台湾维持实质往来；对于后者，日本官方立场认为，二战

相关的法律问题，已在1952年透过与中华民国间的日华合约解决，并不希望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一次战后问题。但在联日制苏的战略考量，以及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之下，中国迅速选择了妥协。

1972年，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中，与周恩来会谈，带回了中国愿意接受日美安保现状、默认台日实质往来、并放弃战争赔偿的讯息，成为了日方决意建交的关键。

井上认为，两国当时选择以“共同声明”而非“条约”形式建交，就是为了避开日本国会审议，以求搁置钓鱼台、台湾、战后赔偿、历史诠释等重大争议。固然，这些议题在日后均陆续引爆，至今仍深深影响中日关系，但就当时而言，在相关争议均源自于冷战结构，非两国间所能立即解决下，“求同存异”式的建交，是唯一且务实的选项。

中日两国关系在建交后快速升温，日本企业着眼于广大的中国市场，乘着中日友好的风潮与邻国的地利之便，前往新天地开疆辟土。根据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研究，当时中国送了两只熊猫给东京上野公园，引发了熊猫旋风，与中国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广获好评。而根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比例，在1980年来到了78.6%的历史新高，可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历史遗产沉重，中日关系冷热交织

但马场也同时指出，向日本开放的中国，固然在日本政府、产业界与一般民众间带来一股“中国热”，同时也投下了阴影。原本在日本基于向往毛主义、文革，支持中国最力的左翼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封建、腐败、贪污等现实状况被披露后，淡出了舆论舞台。而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在缺乏法制、金融、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下，再加上政治挂帅下，相关产业政策朝令夕改，令不少日企铩羽而归。

在这样冷热交织的两国关系当中，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两国友好为方向。在1987至1989年间担任驻中大使，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中岛敏次郎，于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有着详细记载。

中岛回忆道，中国官方在中岛初赴任时，立即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是东芝因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被处以对共产国家全面禁运一年，禁运对象也包括中国。其次，是京都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当时法院判决该宿舍属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接收该宿舍。最后则是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在发言中指邓小平是“云の上の人”（云端上之人），除了指邓身居高位外，还暗讽邓可能为部下所蒙蔽，但中方译为“老糊涂”，引起邓的激愤。

中岛认为，一般而言外交官初赴任的拜会，只是礼貌性的问候，但中国却突然当场要求日方解决具体议题，可说是相当失礼。或许这也反映了胡耀邦失势后，中国对日外交立场的修正，胡耀邦立场亲日，也备受日方敬重。但这并未影响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竹下总理仍在1988年访中，会见邓小平，并承诺提供中国第三次政府贷款，额度预定为8100亿日元，日本国内舆论也无反对声浪。

而当群众从1989年四月开始在北京聚集时，中岛也紧盯着广场的动态，经常亲自到现场观察。在中岛的眼中，运动除了全国各地学生前来声援外，也广获北京市民的热情支持，从劳工甚至公务员都加入抗争的行列。但到了后期，持续二个月的运动已显疲态，根据中岛所见，现场开始弥漫着考虑退场的气氛，但又骑虎难下。就在这个时间点，解放军对群众展开了屠杀。

在六四屠杀发生后，日本大使馆在满城枪声中，开始全力撤侨。在通讯尚未如此方便的年代，拥有专用天线的大使馆，成为重要的资讯来源。但除了撤侨之外，根据中岛的说法，他个人虽然非常同情中国民众，也对中国政府极度不满，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外交上“毫无作为，也无计可施”。

日政治人物丑闻缠身，对六四无暇他顾

原因在于，1989年的日本政坛，正面临着空前的剧烈动荡。1988年，爆发了被称为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RECRUIT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知名企业RECRUIT公司，以公司股票行贿的弊案曝光，自民党政要几乎都卷入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创下新高。

另一方面，当时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史上首位女性党主席、群众魅力惊人的土井多贺子的带领下，正卷起一阵“土井旋风”，剑指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弊案缠身的竹下内阁不得不总辞，改推原本因疏远权力核心，而未卷入弊案的原外相（外交部长）宇野宗佑继任首相，在6月3日上任。

由于宇野才刚于1989年5月访中，一般期待他会对六四有所作为，但就在上任后三天，知名艺妓中西光子公开告发宇野想要包养自己。这桩丑闻让宇野狼狈不堪，自民党在7月的参议院大选中大败，失去了过半席次，宇野引咎辞职，内阁仅维持了69日。继任的总理海部俊树，是从与弊案、丑闻无缘的小派阀中，被躲避弊案风头的大老们拱出来的，和宇野一样，是以拯救自民党的形象为主要考量，在党内并无实力。

在政坛动荡下，根据学者三宅康之的研究，日本外交部门选择维持了既定的亲中路线。外务省（外交部）虽对中国驻日大使杨镇亚表示：“（六四）基于人道立场无法接受”，但关于日本是否会采取实质制裁，宇野首相则表示：“与美中关系不同，日本与中国间有着战争历史”、“采取制裁对邻国很失礼”、“答应了的援助就必须履行，跟人道问题是两回事。”

在政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之下，日本企业的驻中员工也先于其他国家，在六月中旬相继返中。

但当时西方各国均采取了实质作为，包括武器禁运、冻结官方访问、延后或冻结资金、技术支援等制裁措施，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审判抗争者，并延长在国内中国留学生、移民的签证。

相较之下唯一拒绝采取行动，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日本，被各国舆论批判为“唯利是图”、“趁火打劫”。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外务省在六月底宣布暂时冻结既定的第三次政府贷款，以及其他无偿援助计划，并暂停阁员访中。而当时最重要的外交场合，是在7月14日于法国举办的G7高峰会，由于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点也在广场上成为群众的口号之一，因此法国摆出了将在高峰会上，以人权立场严厉谴责六四的态度。



在这样冷热交织的两国关系当中，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两国友好为方向。图：Imagine China

日本虽然拿中国没有办法，仍希望透过劝阻G7的对中制裁，试图在“严厉谴责六四的西方诸国”与“峻拒外国干涉内政的中国”之间扮演和事佬。在高峰会上，日本外交官力陈“制裁只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更加危险”，而在日本背后，也有美国总统老布希的支持。当时布希虽在美国舆论与国会压力下采取了制裁措施，但也立即派出密使与中国高层会谈，表达布希对中美友好的重视

在日本的外交工作以及美国的暗中支持之下，高峰会后各国针对六四的声明中，虽然表明了批判，但并未提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而是在罗列各国既存的制裁后，期许中国若能采取政治、经济改革，并让当时强力支援学运的香港恢复对中国的信任，各国便将重启对中国的往来与援助。

虽然在这段时间当中，中日的外交往来停滞，但日本的一切作为，中国都看在眼里。根据当时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在七月于北京召开的大使会议当中，中方就决定将日本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突破口，并展开对日本政界与产业界的积极接触。在双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起了先前冻结的对中援助，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在九月访中，会见邓小平、江泽民，成为六四后首批访中的西方阵营政要，产业界也接着相继组团访中。

美国也在台面下，推动日本持续前进。根据当时日本驻美大使松永信雄的回忆，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以及世界银行总裁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都对松永表示，希望日本能当率先重启对中援助的领头羊。而当时在日本社会党负责对中关系的河上志雄，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89年的中国国庆前夕，在社会党高层顾虑日本舆论，不便访中的气氛中，他衔命赴中修复两党关系。而国庆晚宴上，他竟意外发现美国前国务卿海格（Alexander Haig）亦是座上宾，令河上不禁感叹，“美国对中外交的城府之深。”

最后，历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设定外交剧本进行。在日本率先行动之下，对于六四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中国，以方励之等知名人士流亡为交换条件，西方各国则以“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可促进未来中国政治改革”为由，找到了下台阶。各种制裁在90-91年间相继解除，与各国间也恢复了高层互访，中国就此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政局混乱、对中外外交工作停摆的情形下，日本在六四后，究竟为什么仍独自坚持亲中路线呢？学者杉浦康之指出，一般认为有希望获得外交主导权、针对侵略历史的赎罪意识、对经济制裁的反感、日本国内对人权议题漠不关心、以及不愿因经济制裁而付出代价等主要原因。

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巧妙地掌握了日本的上述心态，对右派诱之以经济利益，对左派则以历史问题为筹码，让双方阵营都相信“中日友好”有利于日本，在经济上协助中国，才是真正能协助中国在未来走向民主的务实作法。最后成功地在政治上不让步、不损及统治正当性之下，中国以日本为突破口，在短短一两年间，就解决了后六四的外交与经济困境。

但看似大获全胜的中国，其实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六四之后，中国于日本一般民众间的中国热迅速冷却下来，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从88年的68.5%，在六四后暴跌至51.6%（该民意调查于十月进行），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

而为营造中日友好氛围，六四后中国政府一度压抑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声浪，但失去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成为思想上最后的支柱。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共反覆操作历史、领土议题激起反日情绪，虽然巩固了国内支持，但也让日本人的亲中情感每况愈下。在2014年，只剩14.8%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感到亲近，创下历史新低。

在今日的日本，谈到所谓亲中派，除了少数人是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反省，认为需维系中日友好之外，大多亲中声浪仍是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市场的年轻一代，多属此一意见。可以说中国对左派谈历史，对右派谈经济的对日外交手法，在今日仍然是维系中日关系的主要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关心中国的日本人，都就范于上述中国的外交两手战略。知名作家安田峰俊，在去年出版了“八九六四”一书，追踪了数十名与六四相关的人士，访问他们对六四的回忆，以及现在对六四的看法。

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受访者佐伯加奈子（化名），当时正在运动的核心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与当时许多关心运动情势的留学生一样，佐伯经常出没在天安门广场，有时也协助日本媒体搜集资讯。而六四后最让佐伯心碎的，是原本论及婚嫁，当时也

积极参与运动的男友，虽然幸免于难，却变了一个人。从理想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炫耀自己有日本女友，只想着结婚移民日本，依赖佐伯养活自己的人。而且不仅是男友，身边的中国人朋友，对日本人也都势利了起来，“向钱看”，“再也感觉不到真诚。”

从佐伯的访谈，可以看出日本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帮助后六四的中国政府，在钞票与罪恶感之上重建的“日中友好”，是否真正帮助到了中国人民，在三十年后的今日，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子弹，在1989年6月4日当天，不仅杀死了群众的肉身，以及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同时在昔日的“日中友好”潮流当中，两国人民针对和平、平等与民主等政治议题，曾经有过的交心与共鸣，也随之被葬送在天安门前的鲜血当中，渐渐不复为世人所提起。

六四周年

六四30年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9.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2.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3.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4.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5.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6.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7. 白杰明：时代的回旋——“未来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
8.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9.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10. 反《逃犯条例》游行周一凌晨警方强力清场，立法会外爆流血冲突

延伸阅读

张志海：历任中国外长，背负的北京外交路线

钱其琛去世，传媒的报导聚焦两个身份，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另一是外交部长。若这就是钱其琛的工作一生，似是重于现代却缺了从前。

黎蜗藤：老布什的功过盘点与中国情结

如果说，老布什大体是里根政策的执行者，那么其“亲中”因素可能是一个独特和重要的例外。里根对华相当强硬和现实主义，老布什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卞中佩：六四是中国与台湾巨大的分界线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向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